文化教育

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及其对林则徐的滋养

许维勤

[摘要] 鳌峰书院是在清初特定历史背景下，突破当时政策常规，得到清廷格外“恩遇”而创办的一所讲学书院。它担负着复兴朱子理学、安顿东南地区知识社会的使命。经过历任地方长官和山长（院长）的努力，该书院持续了百余年的辉煌，并形成一以贯之以实践理性为核心的学术路线，培养出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早年求学于该书院的林则徐，深受这种学术传统的浸染并影响其终生。因此，深入研究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和办学风格，是解读林则徐人格、才能和思想的文化底蕴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 鳌峰书院 学术传统 林则徐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07）-03-0055-09

Academic Tradition of Aofeng Academy and the Nutriment on Lin Zexu

Aofeng Academy is originated for lectures with special“preference”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Qing. Under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it breaks through the convention on policies of the current. Taking on the mission to revive the Zhu Xi Ideology and settle the knowledge society of southeast region, with the effort of all previous local governors and Shanzhang (deans), this academy had sustained its resplendence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formed an academic route with practical reason as core, and cultivated lots of persons with professional ability. Lin Zexu, studied in this academy in his early age, was inoculated and influenced by this academic tradition through his whole life. Thus, it is an important point of penet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inside of Lin Zexu's personality, talent and ideology to research the academic tradition and operation style of Aofeng Academy deeply.

林则徐玄孙林崇墉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写了一本备受推重的《林则徐传》。该书对林则徐人格特征和为官作风的概括颇为独到，称“文忠一生任事而不牟利，尽瘁而不热中，临难而不退避，受屈而不怨尤。”[①]张其昀为该书作序，更称林则徐为“十九世纪一位最伟大的学者政治家”，“中国文化之人格化”，“允为中国优秀民族性的结晶。”台湾当时正大张旗鼓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故尤重于树立林则徐作为中华文化的人格化形象。若抽去当时特定年代的政治背景，张其昀对林则徐的历史定位还是非常精当的。大陆近年的林则徐研究，也越来越注重于对林则徐人格作传统文化底蕴的揭示。2003年在江苏召开的“林则徐与江苏”全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林则徐是中华文化优秀品格的集大成者”的提法颇多共鸣。然而，传统文化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对林则徐产生影响，学术界一直缺乏细致的研究。林崇墉先生在家学、家风的影响方面做了较多的探讨，但对林则徐求学的关键时期——鳌峰书院的学养，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80年代以来大陆许多

[收稿日期] 2006-5-10
[作者简介] 许维勤（1960—），男，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福州 350001

林则徐研究的代表作，如来新夏先生的《林则徐年谱》、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以及林庆元先生在多篇论文中，都提到鳌峰书院“经世致用”学风对林则徐一生思想、品格和政治实践的影响，这一研究视野的拓展，对厘清林则徐思想渊源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行文关系，这些论著也未遑对鳌峰书院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传统展开正面、细致的个案研究。笔者近年收集了一些该书院的专题资料，兹撰为一文，就教于方家，以冀有利于进一步地全面认识林则徐人格、才能的学术渊源和传统文化底蕴。

一

鳌峰书院是一所怎样的书院？查阅多年来有关福建历史文化研究的各种著述，论者大都对鳌峰书院之于福建文化的意义，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有的学者指出“该书院为总揽全省的较完备的书院”[②]，有的学者注重它是“清代福建学者的讲学中心。”[③]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所教学严格、内容正统的福建最高学府。”[④]但是，未见有人从全国性的角度认识这所书院的地位。笔者认为，这也许是认识的一个盲点。不联系全国大的历史背景和清朝教育文化政策，恐怕很难认识鳌峰书院的独特意义。

鳌峰书院的设立，连缀着殊不寻常的历史背景。清朝入关，既希望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又惧怕传统观念浓厚的知识分子中间潜藏着异己的力量，因此，对于宋元明以来知识社会的汇聚载体——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怀着疑忌心理。顺治帝曾多次诏令禁止士子“结盟订社”，包括创办书院。到雍正四年，胤禛仍借部议不准江西巡抚关于拣选白鹿洞书院掌教之请的机会，御批该项否决“甚是”，并暗指书院“虚张课士之名……藏垢纳污，如释道之聚处寺庙。”[⑤]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清初书院活动是相当萧条的，而且附属于科举教育，成为官学的补充。至于讲求学术的功能，则明显退化。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诏令全国普设书院，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但鳌峰书院的创立，却是个特例。

首先，它创办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早于清朝正式转变书院政策26年；而且，与其它书院之被边缘化迥然不同，鳌峰书院赫然以深厚的官方背景，大张旗鼓地开办。创办人张伯行是福建巡抚，他到任不久就“建鳌峰书院以祀宋五先生，广置学舍百二十间于会城，俾有志正学者肄业，出家所藏书千卷，充. 其中，又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士皆鼓舞振兴，理学复明。”[⑥]作为一省行政长官，张伯行最大限度地动用了他所掌握的行政资源。为了筹措办学资金，他甚至要求各级官吏捐款。《鳌峰书院志》“详文”中提到：“在昔每年……各官公捐养廉银一千一百余两。”顺治帝曾非常有针对性地斥责地方大员不务实政却热衷于倡办书院的行为，是“沽名邀誉”。尽管康熙帝比较支持文教事业，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它政绩未张，却如此兴师动众集中力量办一所书院，仍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最高当权的默许，张伯行不可能如此放手行事。

其次，鳌峰书院之创办，得到最高当局的格外“恩遇”。《鳌峰书院志》多处提到，该书院创办之初曾得到康熙帝“赐额赐帑”和御赐书籍的殊荣。赐额即康熙五十五年“御书‘三山养秀’四字以额其堂”；赐书，据载有康熙御赐经书八部、《御书孝经法帖》一本、《御书渊鉴斋法帖》十本、《淳化阁法帖》十本[⑦]；赐帑，具体数目不明，但“帑”特指国库钱财，可见康熙曾动用国库钱财补助该书院。康熙帝对书院比较宽容，蒙他赐额赐书的书院，全国有十余所[⑧]。

再次，鳌峰书院一开始就被明确定位为学术研讨的机构，而且被赋予尽量扩大影响力——远比一般书院为高——的期望。在此之前，福建已有一所全省性的“共学书院”，鳌峰书院设立后，其地位远远高于共学书院。“会城有两书院，一为共学，一为鳌峰。共学者，课文之书院也；鳌峰者，讲学修书之书院也。”[⑨]后来干脆让鳌峰书院兼并了共学书院。为了突出鳌峰书院，张伯行大事“延致各属俊秀”，从全省各地（包括台湾）招集优秀学者和士子，在鳌峰书院讲求学术，刊刻各种书籍和讲义，活跃学术气氛，刻意扩大其聚合和

辐射效应。一时间，“十郡士　膝踠足而至。”[10]漳浦蔡世远、蓝鼎元，宁化雷鋐，海澄郑亦邹，长汀黎致远，莆田郑文炳，南平余祖训等，都是早期入院讲论和刊书的著名学者。而报考入学的学子，也极为踊跃。在当时书院政策尚不宽松的背景下，能容许一所书院在知识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个特例。

如此看来，鳌峰书院之设，实际上隐显着清朝最高当局的某种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安排意在何为？以下两点应是解析的关键。

其一，福建曾是南明抗清、郑氏割踞和三藩之乱的基地，当地社会与清朝政权的隔膜自不待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士大夫之东渡者盖八百余人。”[11]这种来自知识社会的同仇敌忾，让清朝统治者在事后几十年内仍然心有余悸。为笼络人心，安顿知识分子实为根本之计，康熙显然有意让闽、广一带知识分子一向热衷的书院这一载体，更多地承载收容、安顿士心的职能。据有的专著统计，康熙朝全国共建书院 537所，其中在福建、广东所建最多，共达 126 所[12]，将近占 1/4。同时，台湾也正是在康熙朝才建立了最早的 8所书院。这些书院的办学模式，一律移植自福建。据原台湾大学教授张正藩先生研究，“台湾书院所订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13]由此可见，鳌峰书院是作为体现对闽台广特惠文化政策、具有示范意义的文教机构而出现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清朝“毂中术”设计的一部分。

其二，鳌峰书院设立之前一两年，正是康熙帝最热衷于理学之时，尤其是推崇朱子理学（又称闽学）。“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研求探讨。”[14]康熙欲重振理学，不但要倚重福建安溪籍理学大师李光地，而且必须依托福建理学故地探求理学正宗。然而，经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心学的冲击和清初兵灾，福建理学传统已显衰微之状，人才凋零。康熙希望福建能重现像南宋一些著名书院那样的机构，将闽学发扬光大起来。

可以作为以上两点分析之佐证的，是康熙帝在遴选福建主官时的精心安排。

张伯行是河南理学家，早年即以办学和推崇程朱理学闻名，康熙帝注意到他时，他只是个道员，但立即被提拔为江苏按察使。仅仅过了一年，康熙帝又“南巡至苏州，谕从臣曰：‘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时命所在督抚举贤能官，伯行不与。上见伯行曰：‘朕久识汝，朕自举之，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擢福建巡抚。”[15]

这是一例罕见的破格提拔，其用意显然在为福建安排一位重视文教的主官。结果也恰如所愿，张伯行抚闽，最大的政绩就是以创办鳌峰书院为核心的一系列倡学兴教举措。从他创办书院规模务求其大（“广置学舍百二十间”）和资料务求其备（“广搜先儒文集遗书，次第刊布”）来看，这所书院作为最大的理学讲求基地的目的性是相当明确的。张伯行因这项政绩而继续升迁。他调离福建不久，康熙帝最倚重的理学大师李光地，亲自关照鳌峰书院，“时来相与往复辩论，要皆黜浮华崇实行，以阐发濂洛关闽之旨。”[16]可见清朝高层对这所书院的重视。

鳌峰书院的特殊待遇，在以后的历朝皇帝统治期间继续得到体现。雍正十一年转变书院政策后，要求每省在省会确定一所书院作为重点书院，“各赐帑金一千两”[17]，鳌峰书院无可争议地取得了这一位置。事实上，鳌峰书院所得帑银远不止此数，据《清会典》卷十九所列各省会书院经费清册，一般每所拨给数百至二千余两不等，惟独鳌峰书院拨给“四千三百七十三两有奇，钱三百四十千有奇”[18]，为全国遥遥领先。

乾隆帝继位的第二年，又给鳌峰书院赐帑一千两，并特赐御书“澜清学海”横额。据白新良先生《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一书所述，乾隆帝给鳌峰书院的赐帑赐额，是他给所有书院同类赐与的首例。[19]

到了嘉庆四年，由于生员增多，学舍不足，新任闽浙总督玉德、福建巡抚李殿图、布政使白景安、按察使赵三元等地方大员兴师动众，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翻修和扩建。扩建后的鳌峰书院，设有藏书楼、监院公廨、大

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和一个能容纳400人的考棚。院内有假山荷池，亭台幽径，富于“园林之胜”。

19世纪后期，由于传统教育的整体性没落和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鳌峰书院在时代潮流中黯然失色，但它依然是福建地方官府重点扶持的高等学府。直至1905年随着科举制度废止而被改为近代学堂，鳌峰书院在其存在的198年之间，一直据有福建最高学府的地位。

这些殊遇，揆诸清朝全国所有书院，均无出其右者。历史上有名的白鹿洞、岳麓等书院，均已辉煌不再；江浙一带虽有不少学术上很有影响的书院，但以学运长久和政治荣耀而言，也没有超过鳌峰书院的。因此，鳌峰书院应为清朝东南地区的第一学府，甚或是整个清朝首席书院。在嘉庆初年为纪其盛而修的《鳌峰书院志》之中，当事者就志满意得地宣称：该书院“规模制度宏琏丰敞，盖不特视昔有加，求之各省，或亦罕俪矣。”[20]

二

清廷对鳌峰书院的特惠，是出于对它在理学建树上有所期待，因此，鳌峰书院的学术积累，也就离不开朱子理学这条主线。但鳌峰书院历代相沿的学术精华，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其治学精神。

从创办初期到嘉庆年间的100年左右，鳌峰书院经历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该书院至少有三次发展的高潮。这三次高潮与全国学术风气变幻息息相关，但并未随全国学风的转换而摇摆，而是以闽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为内在品格，积极吸收各个时代的学术精华，完成自己特有的学术积累。

一，创院诸公注重人格养成和对学、行并重学风的营造。

清初理学之重扬，有鉴于明朝中叶以来王阳明心学之空疏和诞妄。但理学之所以遭到心学冲击，实亦由于其末流之空谈义理。如何重新发扬光大理学的根本精神？张伯行的主张是，抛开末流，回到程朱文本，实心讲求，轻阐发重践履。他认为“入圣门庭”就在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之中，而“千圣之学括于一敬”[21]，非主敬无以穷理。所以他效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把“居敬穷理”作为诸生圭臬。他所精心挑选的书院首任山长蔡璧，是个有着30多年教学经验的教育专家，闽学造诣精深，教学上主张“以器识为先”，“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22]这些主张与张伯行的办学思想相表里，从一开始就为鳌峰书院奠定了以人格养成为基、学与行高度统一的学风基础。

蔡璧的儿子蔡世远，早年随父在鳌峰书院协助校刊典籍，中试后曾在京参与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受到李光地赏识。蔡璧去世后，李光地举荐世远为鳌峰继任山长。康熙五十六年春，李光地回闽南省亲路过福州，蔡世远率诸生邀请这位大师到鳌峰讲学。李光地的讲学轰动整个省城，听者上千人，事后讲学内容被编为《鳌峰讲义》，对书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光地的学术主张，他自己概括为“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三个方面。他认为朱子论学要旨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躬行，“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穷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实也。”[23]而一切学术的归宿，在于“实”，也就是“周当世之务”，所以，为学贵在“身体力行，见诸行事”[24]，力戒空疏。从实用出发，经典而外，天文、地理、形胜、农桑、医药、河渠、兵法、政事、算学无不当在学习之列。

这种“身体力行，见诸行事”的学术路线，得到蔡世远的忠实贯彻。蔡世远“好语经济”，学主“经世致用”。年富力强的他，以振兴书院为己任，并自信鳌峰书院的影响将“下关风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于一方一时，远者功及于天下后世。”[25]因此，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立定远大志向而读书。在一封《答鳌峰书院诸生》书中，他教导学生“以立志为始，以孝弟为基，以读书体察、躬行克己为要”，不要满足于讲论性理和研习时文，“不佞所望者，非徒得巍科膺显秩而已也。凡我同人，亦望其希贤圣，饬廉隅，循循不息，以振

道南之绪而已。”[26]

李光地、蔡世远的讲倡，使鳌峰书院突出人格养成，学、行并重的学风更加丰满，并进而沉淀为一种宏器识、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既是对闽学实践理性精神的发扬光大；又是清朝前期有识之士承鼎革之后，反思两宋以来心性义理之学得失的成果的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引起福建知识社会的强烈共鸣。经蔡世远“一番心血”苦心经营，鳌峰书院“人文之盛见称于东南”[27]，出现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二，孟超然维护闽学正统的努力和鳌峰书院对汉学精华的兼容。

从康熙末到乾隆初，朱子理学一直受到学界追捧，鳌峰书院创院诸公所缔造的学术传统，也一直被奉行不辍。但到乾隆中期以后，宋明理学受到汉学的强劲冲击，在这种情景之下，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于理学名臣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朋党之争，令乾隆帝反感道学家的伪善，兴趣转向经史词章；加上“文字狱”的血腥恐怖，令学者纷纷逃避于故纸堆。一时间，学术界“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梁启超语)，以考据训诂见长的经史学者受到重用，而理学家受到冷遇，经世学派更是噤若寒蝉。连科举考试也在导向做“考异集览”的功夫。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以讲明理学为宗旨的书院，纷纷转而研经治史、博习词章。一批著名经史学者被派往或聘请到各地有影响的书院主讲。鳌峰书院也曾由长于经史的学者沈廷芳任山长。

然而，鳌峰书院并未出现被导向新的学术路线的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孟超然维护闽学正统的努力。孟超然于乾隆三十八年主讲鳌峰，面对考据之风的冲击，孟超然旗帜鲜明地表示：“吾儒学向主于经世，故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坠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28]他要求学生“解弃一切束缚，励以诚”。他自己以身作则，躬践力行，极得学生爱戴。在他的努力下，书院“人人自奋于学，材俊辈作，记者谓不啻世远主讲时也，”[29]带来了书院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不过，在汉学“如日中天”的压力下，鳌峰书院不可能不受影响。继孟超然之后，另一经史学者张甄陶主讲鳌峰，开始提倡汉学。史载：“乾隆庚子以后，闽士知讲汉唐注疏之学，虽由大兴学士朱筠、太傅珪昆弟相继视学提倡风尚，然其端发于甄陶。”[30]可见，张甄陶是将汉学引入闽中的第一人。朱筠、朱珪担任福建学政期间力崇汉学，曾引起一些学者跟风“持汉学，好排击宋儒凿空逃虚之说。”[31]但张甄陶在鳌峰书院所提倡汉学，并未以排击理学为能事。相反，他“言学以宗朱子而博综旁通，不为苟同”[32]，实际上是以闽学去统领汉学，以汉学之实证和严谨来补闽学末流之空疏，究其实质，依然是“明体达用”的学术路线。正因如此，以维护鳌峰学统为己任的孟超然，给了张甄陶以极高的评价：“先生学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体达用为归，以济人利物为效；淹洽似王深宁而切于世务，忼慷似陈同甫根极理要，虽不究其用而卓然必传于后。”[33]

孟超然的评价说明，鳌峰书院在乾嘉汉学的冲击下，并未迷失自己的学术方向而陷入繁琐考据的泥淖，相反，它再一次以闽学的实践理性，兼容了汉学严于求证和广闻博采的学术精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在当时的全国学术生态之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成为它后来在全国沉闷的学术气氛中，能够率先揭出经世致用旗号的学理基础。

三，郑光策以“经邦济世”主张，开拓书院发展新局面。

孟超然认为抛开义理而一味埋头于考据有“坠于小人之归”危险的观点，是极富于远见的。事实证明，乾嘉学风最终造成了实干人才的奇缺。有人批评当时的学术是“术愈精而人愈无用”，表面上人才济济，实际上“求所谓体用兼具，学问经济上不负国，下不负民者，果何人哉？”[34]到了嘉道年间，社会矛盾的激化呼唤着经世致用学风的复萌。在这种情况下，鳌峰书院的学术传统更加焕发出光采。

学术界在评论晚清经世致用思想浪潮时，往往突出龚自珍慷慨激昂的言论对冲破乾嘉考

据学沉闷学风的作用。为人熟知的一句评语就是张维屏所说的“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35]但约先于龚自珍之前的三、四十年，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早已在鳌峰书院悄然复活，并且被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

嘉庆初，郑光策主讲鳌峰。他发扬蔡世远、孟超然等人的经世理念，继续抨击繁琐考据的学风是“气习污下，奔竞卑鄙。”[36]其得意门生梁章钜也讽刺说：“今之墨守汉学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残守阙，远征冥搜……汉博士之书驴券，三纸尚未见驴字。”[37]与之相对立，郑光策鲜明地主张为学要“讲明修己治人之术，经邦济世之方。”[38]他决心以鳌峰书院的讲席为基地，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不良风气。

郑光策强调，欲求取“经邦济世”之学，首先要立定远大志向，“志定而后教有所施”[39]；而为学宗旨，贵在“明体达用”，因此，求知不受教条之限，“凡经世有用之书，必当渐知讲求。”[40]郑光策还强调，求学要有“不已”的进取精神，他说：“不已者，造道之大业，学圣之极功。”[41]只有通过学习不断进取，才能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郑光策对书院的教学制度进行了改革，“一课制举义，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毋汩时艺。”[42]也就是把讲求实用之学，提高到与应试并重的地位，避免学生因埋头于做八股文而泯灭创造力。

郑光策所希望学生致力的“经史之学”，不是指那种耕经耨史的考据功夫，而是通经融史，明体达用。“明体达用”是郑光策对经世致用的另一种表达，明体就是穷理致知，达用就是学以致用。这一理念实际上包涵了汉宋兼容，而旨归于“用”的意义，与鸦片战争后一些洋务官员的思想有许多暗合之处。这也就是说，郑光策的学术主张，在当时具有相当超前的意义。据《闽县乡土志》儒林传记载，自郑光策主讲鳌峰书院，“欲学者力经史之学，以期实用，士习丕变焉。”这里所说的“士习丕变”，也就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把鳌峰书院推向发展的第三波高峰，而且对福建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近代福建多开明之士，人物之盛，世所瞩目，应该说与这所东南第一学府的学术企向有极深的关系。

综上所述，鳌峰书院从创院到嘉庆年间，宏器识、端品行、务笃实、尚力行、广博采、求实用的学术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其间虽因全国学术风气的变幻和主院人理念的不同而出现过一些波动，但书院每一次兴旺，必是对其固有学术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条百余年一脉相承的鲜明学统。福建学政叶绍本在《鳌峰书院志》的序言中，用“讲习居敬穷理之要，明体达用之学”来概括鳌峰书院的办学理念，这一概括也是对该书院百年学统的认定。这一学统，以闽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为主线，以人格养成为重点，以明体达用为旨归，积淀了明末清初以来经世派学以致用和汉学家求真务实的学术精华，将知与行、学与用融为一体，体现了近代科学教育思想引进之前，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所达到的一种新境界。

三

郑光策“明体达用”的教学理念，为鳌峰书院开创了发展的第三波高峰。就是在这一波高峰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吸纳了鳌峰书院学术精华的一个优秀人才集群应运而生。应该说，这一人才集群的产生，不仅仅是某任山长的个人之力所赐，而且是鳌峰书院一脉相承的百年学统的结晶。

早在创院初期，蔡世远对书院培养人才就有过很高的期望。他在给闽浙总督满保的信中说：“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书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与长善而救失，虽其后未必悉底于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43]蔡世远还特别说明，他所指的一二人、二三人，不是一般人才，而是指汉董仲舒、贾谊，唐韩愈、陆贽，宋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流人物。他认为当世并非没有此等人物，只是“隐而不见”或“陶而未成”。今蒙朝廷对书院如此重视，“此间定有应运而出者。”[44]这毋宁是对鳌峰书院培养人才的一个预言。蔡世远虽未在有生之年培养出此等人才，但在鳌

峰创院约一百年之后，这一预言成了现实，恰恰暗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

经过百年学术积累，到嘉庆初，鳌峰书院的确出现了一个人才辈出的黄金时期。当时书院读书风气空前浓厚，全省各地（包括台湾）前来求学的学生人满为患，乃至三、四人共住一室。受命筹措鳌峰书院扩建事宜的福建粮驿道赵三元描写道，当时院内连池边的“鉴亭”里都挤满了读书的生童，而临池的一座废阁上，住满了人，“溽暑冱寒，苦甚”[45]。书院无论是生员质量还是教学质量，都达到了顶峰，每届乡试，中举人数都在三、四十名左右，嘉庆三年戊午科中举多达50名；考中进士的人数也极为可观，嘉庆丙辰科考中5名，己未科考中9名，辛酉科考中15名，壬戌科考中11名，乙丑科考中5名。区区一所书院有此成就，的确让人刮目相看。

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人才未能突破科举进身的窠臼，但是，这并不掩盖他们的才能出类拔萃的事实。鳌峰书院的学子，在当时的福建地方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是时，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名公卿，次亦化其乡人。盖乡亲见其为大府所礼重，一旦奉其言语书籍归来，外艳内愧，辗转仿效，人有恐未免，乡人可为尧舜之奋，盖士习人心于是大醇，其以学化人如此。”[46]研究福建地方史的学者不难发现，清代福建许多地方文献和文教机构，都离不开鳌峰学子之功。《鳌峰书院志》列有举人以上名单870余人，除了游宦或游幕外地者，大多数都成为其籍贯地的文化干才。其中不少人还不畏艰险，到当时正在开发中的台湾谋职，截止嘉庆九年，有确切名姓担任台湾各地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他们对台湾早期的文教事业，具有开辟之功。

至于所谓“醇茂敏达出为公卿”的“上者”以及在其他领域具有突出成就者，也不不胜枚举。截止1805年，鳌峰书院共考取进士154人，博学鸿词科9人。其中除了高官要爵，不少人在文学、史学、经学、刑法、天文、地理、兵法、河渠、水利、农桑、音韵、乐理等方面具有杰出才能。而就读于乾、嘉年间，活跃于嘉、道时期的鳌峰学子最引人注目。他们中有官至总督、刑部尚书，精于刑律，民间传为包拯式人物的陈若霖；著名学者、被梁启超称为“今文学之初期”的“研究今文遗说者”陈寿祺；“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的梁章钜；与龚自珍齐名、“天才奇逸”的诗人张际亮；为官清廉的工部尚书、曾国藩导师廖鸿荃；以及林则徐等。他们都有以经世为己任、注重人格修养、长于实干的共性。而林则徐，正属于蔡世远所说的“应运而出”的历史巨人。

林则徐进鳌峰书院的时间是嘉庆三年。当时林则徐14岁，刚考中秀才，此后直到20岁考中举人，前后共在鳌峰求学7年。正处于人生成长关键期的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得到怎样的教益呢？林则徐早年有一些读书札记，后来被整理成《云左山房杂录》(现藏于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他在鳌峰书院读书及修为的情况；林则徐出仕后，又长期与鳌峰学者保持密切联系，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他们当初求学的共同志向。

从《云左山房杂录》来看，林则徐求学期间阅读范围相当广泛，有儒家经典以及宋明理学名著，也有前秦诸子百家著作和《史记》、《汉书》等史籍，还有历代诗文、笔记、碑帖、医书甚至佛经。其中林则徐随手记下或摘录的一些警句，既反映出林则徐读书心得、个人修为和宏伟器识，也是鳌峰书院学术环境对林则徐产生影响的痕迹。比如，他写道：“岂为功名始读书。”这恰恰是鳌峰书院历代掌教教人“以器识为先”、“以立志为始”、“不必以举业为汲汲”理念的反映；他还写道：“世尽思居奇之居，人竞为染指之望，徇私吹索，借端凌践”，“矫饰虚声，潜纳贿赂，陋习相沿，谓之名实兼收，”反映出鳌峰书院注重品德修养和林则徐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他又写道：“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刘勰语)，“勿苟且雷同，勿偏执臆见”，“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这些警句，无不反映出鳌峰书院“讲习居敬穷理之要、明礼达用之学”的学术宗旨。这些教益，令林则徐终生受用。出仕后，他一直保持旺盛的读书和研习有用之学的欲望。在翰林院期间，不少同僚都忙于交游应酬，而他却与同省莆田人郭尚先“相与研究舆地、象纬

及经世有用之学。”[47]又利用翰林院丰富的史籍和典藏，研究先贤名宦的治水经验；后来历官十四省，又始终保持勤政、廉洁的作风。究其渊源，这些无不与鳌峰书院的学养修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则徐在鳌峰书院时，掌教正是郑光策。林则徐对他很尊敬。郑的女婿梁章钜也是同时期鳌峰诸生。林、梁二人意气相投，后来在仕宦生涯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以究心实务、谈文论诗相砥砺。梁章钜有诗：“论文集衙斋，待漏趋紫宸；古谊各敦励，里言多苦辛。”[48]就是说的他们同为京官时的交往。道光十五年，梁章钜为编辑尊翁遗集，以郑光策《抱膝图》示林，林则徐“熏香瞻拜，不禁泪涔涔下也。”并作诗曰：“遗影追寻立雪前，春风书带正翩翩。谁知稷下闻琴泪，已兆隆中抱膝年。座有心香余泽在，集题脚气几人传。韩门李汉编文后，忆否桐枝瘦可怜。”[49]表达了对先师深厚的感情和对鳌峰求学时代的怀念。

林则徐所敬仰的另一位鳌峰学者，是陈寿祺。陈寿祺既是鳌峰书院的学生，又在道光年间担任鳌峰书院山长，学识淹博，尤其留心时务。他对林则徐寄托着极高的期望。道光二年林则徐进京受命，陈寿祺赋诗送行，中有“苍生系安危，所尚在宏毅”之语，还希望林则徐能效李光地：“安溪本通儒，拥旄功泽暨。落落逾百年，后贤每觎欷。”[50]为此，林则徐写了《答陈恭甫前辈》诗，感谢陈寿祺的推许和鼓励，说自己“束发读公文，珍如觏鸿宝”，一向崇敬陈的为人和学问。他还在诗中痛斥那些庸官、贪官，认为为官之道“要在持守固，庶几恻隐存。知人仰圣哲，弊吏扶元元。举错惬舆论，激浊澄其源。侧闻官方叙，驯致民物蕃。”并表示自己要“但当保涓洁，弗逐流波奔”[51]，当个勤政爱民的好官。后来，林则徐在通信中，经常将自己的施政举措和为难之处向陈寿祺陈述，有些不便公开的想法也私下跟陈寿祺交流。比如，他关于让黄河改道的重要治水思想，就是在给陈寿祺的信中表露的。这些都表明，林则徐虽身在官场，仍对昔日师长的教益，非常看重。

总之，鳌峰书院这所百年学府浑厚的学术传统，对林则徐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在人格上，他从朱子理学的“居敬穷理”而登达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境，养成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宏大器识和端凝厚重的品行。在学识上，广泛的涉猎养成了他深厚的学术根柢，使他在政治实践中游刃有余，运用自如。在价值观上，“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更使他具备了一双开放的慧眼，这是他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基础。林则徐在鳌峰修业 7年，离开之际，他已是蓄势待发的“神驹”，师友和家乡父老无不深信他前程的远大。同乡理学家林芳春一再地赞扬他：“陈恭甫、梁紫林（芷邻）乃福州之宝贝，继此其元抚（林则徐字）乎?”“甲子榜一个林则徐竟是福州一活宝。”“林元抚诸般都会，真是活宝，定为出色翰林。”“同乡若陈恭甫、梁芷邻、林石麟（林则徐又字）俱可望。”[52]汀漳龙道百龄初识林则徐，即“目为大器”。不久，林则徐入张师诚幕，也被这位以精干著称的封疆大吏诧为“奇才”，认为他将来功业必在自己之上。林则徐后来果然以无可辩驳的实绩，验证了这些人的预见；而他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实干才能，则是对鳌峰书院学术传统的最好诠释。

四

鳌峰书院以讲学机构而辉煌百余年，却并不以产生什么学派著称，而是以作育人才而引人瞩目。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这一现象与林则徐被视为经世致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并不以经世致用理论，而主要是以实践得到确认的现象，有着内在的一致。这种现象可以有多种解读，但笔者认为，闽学的实践理性精神，应是解剖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一种冷静、理智、平和而非迷狂、神秘、极端地对待事物的理性精神，它导向对事物“理”的认知。但是，当“理”的探求遇到不可知或不可达的境界，它又转为“存而不论”的现实主义态度，注重从实践中妥善地去处理它，而不刻意去作纯粹的思辩、抽象或陷入宗教式的迷狂。同时，实践理性又意味着服务于实践的理性，也就是说，“理”的探求，最终必须回到实践才有意

义，“格物致知”终归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即物穷理”过程中，“躬践力行”至关重要；为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明体达用”。

这种实践理性精神在儒家创始人那里就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子理学兴起后，则融入了闽人务实、崇本的价值观念，在世代传承中，甚至化为了福建学人的价值坐标。李光地在论闽人独尊朱子理学时说：“时则姚江之学大行于东南，而闽士莫之遵，其挂阳明弟子之录者，闽无一焉。此以知吾闽学者守师说，践规矩，而非虚声浮焰之所能夺。”[53]道光年间主讲鳌峰书院的陈寿祺也说：“榕坛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导朱子之道脉而独溯宗傅。”[54]思辩色彩过于浓厚的王阳明心学，和逃避现实的乾嘉汉学，在福建找不到市场，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而闽学传统从宋至清，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其义理之阐发众说纷纭，到头来也没有哪一派特别具有生命力和权威性；唯有“居敬穷理，明体达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最终成为福建“正学”的最高准则。质而言之，鳌峰书院的百年学统，正是在这一准则之下对闽学传统的演绎，所以，它没有导向以学理的阐发而产生学术流派，而是导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同样，在这样的价值氛围中走出的林则徐，也主要是以“立德”、“立功”的政治实践来演绎自己的价值取向，而非以“立言”来表达“经世致用”的治学主张。这正是实践理性精神的内在品格。

---

①林崇墉:《林则徐传》(普及本)第 2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76年版。

②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第 19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

③徐晓望:《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第 22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

④林庆元:《沈葆桢:理学德治,洋务自强》第 16~1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年。

⑤《皇朝政典类纂》卷二二六。

⑥《碑传集》卷十七。

⑦⑩⑳《鳌峰书院志》卷一,嘉庆十一年正谊堂刻本。

⑧⑲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 127页、第 166页,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年。

⑨㉕㊸㊹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 518页,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⑫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 133、135页。

⑬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第 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5年。

⑭《清史稿》二六二,李光地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版《二十五史》12,第 1098页。

⑮㉑《清史稿》二六五,张伯行传。

⑯㊺《鳌峰书院志》,赵三元序。

⑰《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七,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条。

⑱转引自陈元晖等编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 92—9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年。

㉒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卷九。

㉓李光地:《榕村全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㉔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三。

㉖㊷㊻《鳌峰书院志》卷六、卷五、卷二。

㉗《鳌峰书院志》叶绍本序。

㉘孟超然:《家诫录》卷下。

㉙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列传”卷三十七,孟超然。

㉚㉜㉝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儒林传”卷五,张甄陶。

㉛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儒林传”卷五,谢震。

㉞卜起元:《潜庄文钞》卷二。

㉟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下,第 11页,国学扶轮社本。

㊱㊵郑光策:《西霞文钞》卷下、卷十,清嘉庆十年刻本。

㊲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四。

㊴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四,中华书局本。

㊶《福建通志》卷四十,儒行·郑光策。

㊼《兰石公年谱》(见《增默庵文集》。

㊽梁章钜:《退庵诗存》卷十七。

㊾㊿《林则徐全集》第六册,第 174页、第 22—24页。

㊿陈寿祺:《左海诗钞》第一卷。

[52]林芳春:《介石堂文钞》卷六“语录”下,清道光五年刻本。

[53]蔡清:《蔡文庄公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沈瑜庆、陈衍编纂:《福建通志》,列传卷六,陈寿祺。